

世界史图书馆

CAMBRIDGE

理解早期文明 比较研究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加〕布鲁斯·G. 崔格尔 (Bruce G. Trigger) 著
徐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4012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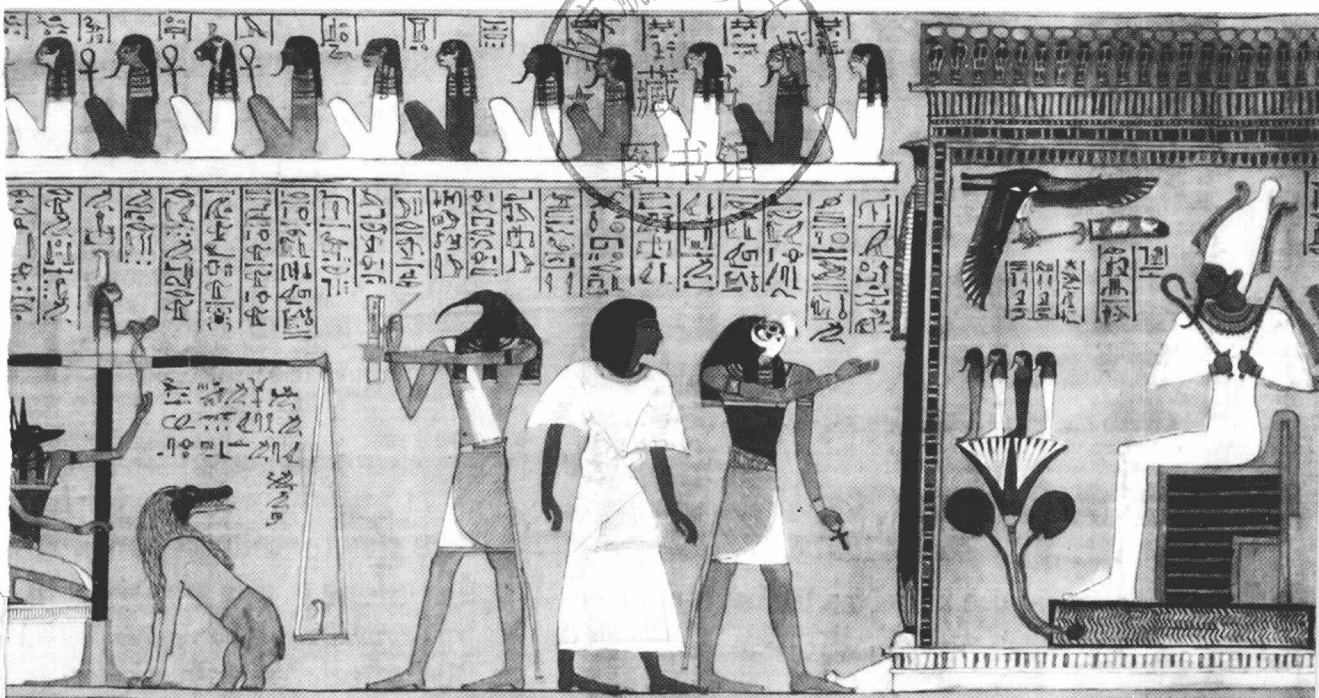
K12
19

理解早期文明

比较研究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加〕布鲁斯·G.崔格尔 (Bruce G. Trigger) 著 徐坚 译



北航

C1699348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12
1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19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 / (加) 崔格尔 (Trigger, B.G.) 著；徐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世界史图书馆)

ISBN 978-7-301-23595-9

I. ①理… II. ①崔… ②徐… III. ①世界史—古代史文化史—研究
IV. ① K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9815 号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1st edition (9780521705455) by
Bruce G. Trigger,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销售。

书 名：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

著作责任者：〔加〕布鲁斯·G. 崔格尔 著 徐坚 译

责任编辑：张 晗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3595-9/K·100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163.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57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mm×1020mm 16 开本 35.75 印张 72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前言

1959年，我还是多伦多大学的本科四年级学生时，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是年轻的助教授，他开设了一门旨在介绍生态学和新进化主义分析领域最新进展的课程。我写了一篇名为《城市化的定义》（A Definition of Urbanism）的课程论文。文章比较了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埃赫塔吞（Akhetaton）、罗马、一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和一个中世纪西欧城市等五个城市的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特征。我得出结论，这些城市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都不支持吉迪恩·肖伯格（Gideon Sjoberg）对“前工业时代城市”的通则性建构（Gideon Sjoberg 1955, 1960），早期城市应该按照多线方式，而不是单线方式发展。最近，在落满灰尘的书柜里，我找到这篇文章，看来我对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的兴趣由来已久了。

1959年秋天，我成为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有机会在乔治·彼得·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和克莱伦·福特（Clellan Ford）的指导下学习跨文化比较的理论和方法。1963—1964年，我又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向西北大学的前辈劳尔·纳罗尔（Raoul Naroll）请教。本书的写作极大地受益于这些已经谢世的学者们。

在那之后，由于投身于聚落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考古学史，我对比较研究的兴趣被搁置起来。然而，从1970年开始，我大约隔年在麦吉尔大学开一次名为“早期文明的社会机制”的课程，近年来改名为“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这个课程一直鼓励我保持对早期文明的运作方式的兴趣，也催生了比较研究这些社会的若干论文（Trigger 1972, 1976b, 1979, 1985a, 1985b, 1990a, 1990b）。

当完成《考古学思想史》（Trigger 1989）的写作后，我开始寻找评估文化生态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者之间相互冲突的主张的方法，文化生态主义者认为社会受到适应性因素的影响，而文化相对主义者则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由文化决定的。在我看来，理论教条主义已经对研究施加了负面影响。因此，我想通过考察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七种早期文明，实证性地判断人类行为和信仰的哪些方面受到所有人类共享的因素的影响，而哪些受到文化系统的特质性特征的影响，这七种文明中，除了两个以外，都展现出独特的发展

ix

x

轨迹。通过这种办法，我希望提供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本体论基础。我的研究结果就呈现在本书之中。

默多克常常告诫学生们，在对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社会的研究中，去情境化特征的跨文化比较不过是揭示社会文化行为显性模式的取巧之道，而这原本需要更细致的研究。在研究诸如早期文明这样资料甚少的样本时，如果研究者希望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就必须在更具情境的框架中考量资料。本书需要在功能性情境中展现资料（大体类似于“深描”），这或可解释为何其篇幅如此庞大。因此，这成为我对目前所知的记录最为完备的七种早期文明的理解的总结。这实现了我的夙愿，即发表一部既包括对这些文明的综合描述，又包括对其异同如何形成及为何形成的详细分析的著述（Trigger 1993: viii）。

1989年以后，我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本书上了。从1997年11月开始写作，初稿完成于2001年6月。书中征引文献最晚到2001年年初。本书尚处在草稿阶段时，我受邀在各种场合发表研究总结，强烈影响了本书的形成。最早的演讲是我于1991年2月受邀访问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科学和人文研究中心时在该校考古学系发表的。第二个演讲“早期文明形成的制约和自由”，由斯尼德讲座基金资助，于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发表。次年12月，我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墨罗讲座上发表了类似的演讲。每次演讲之后颇具启迪性的讨论都极大地帮助了我的研究。令我的研究受益更丰的是在访问开罗美国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系期间发表的关于古代埃及文明的四次演讲。一年后，这些演讲以《早期文明：情境中的古代埃及》（*Early Civilizations: Ancient Egypt in Context*）为题出版（Trigger 1993）。该书的反馈也给我后来的研究带来不少帮助。

第二章的大部分内容基于题为“跨文化比较和后现代主义”的未刊演讲，这是1994年12月，作为理论考古学会议的特邀演讲人，我在布莱德福德大学发表的。第二十五章的讨论来自发表在《挪威考古学评论》（*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上关于文字系统发展的更详细的研究（Trigger 1998b）。

同事们和研究生们显著地补充和修正了我对早期文明的认知，或者提醒我注意一些重要文献。我尤其感谢约翰·白恩斯、马里奥·邦格、史蒂芬·克里斯索马里斯、杰瑞·米康宁翰、卡西拉·达洛斯、伯纳尔多·杜波罗夫斯基、哈维·菲特、卡塔雅·戈伯斯、希拉里·戈普尼克、彼得·格斯、约翰·霍尔、艾利斯·吉欧、安德里亚·麦克多维尔、乔伊斯·马库斯、林·麦斯克尔、斯蒂芬·米森、劳拉·纳德尔、琼·奥特斯、托马斯·帕特森、安·妮帕柏、杰罗姆·卢梭、菲利普·索兹曼、弗兰克·史密斯、迈克尔·史密斯、W. J. 斯特普、伊丽莎白·斯通、达尔科·苏凡、亚历山大·冯·格尔内、芭芭拉·维尔弛、叶山（Robin Yates）和岳斐（Norman Yoffee）。我也要感谢多年来选修了早期文明课程的本科

生，他们的讨论、提问和作业也增进了我对这些社会的了解。1999 级和 2001 级的同学选修此课时，适逢本书的写作，因此，他们的帮助尤其值得感谢。无疑，还有不少人在过去的十二年里给予我重要的帮助，而未能一一提及，我只能深表歉意。

本书中，我用过去时态描述早期文明。这包括了约鲁巴（Yoruba），尽管在众多方面，他们的文明从殖民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在描述早期文明时，我尽量采用通俗平易的语言，避免使用诸如领地、封建、农民、（教职人员的）俸产、私人领域等等主要和中世纪欧洲或者古典希腊罗马文明相关的术语。这导致了一些累赘的词汇乍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我相信这种处理可以有效地减少理解早期文明时的偏见。

在所有早期文明语言中，我仅仅学习过埃及文。其他语言的拼写法的统一实在是个让人烦恼的问题，因为每种语言都有不同的转写成罗马字母的音译方案。在可能的情况下，我都采用目前的转写方案，但是我也有时也不得不接受那些仅仅出现在某篇二手文献中的拼法。在古埃及文的转写中，我仍然采用不含假定的元音字母的方案，同时倾向于尽量少地采用注音符号。

xii

尽管我阅读了包括萨哈冈（Sahagún 1950–1982）关于墨西哥谷地、科博（Cobo 1979, 1990）关于印加、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921）关于约鲁巴等绝大部分用英文发表的第一手材料，但是我更常采纳关于古代文明的二手材料，因为这些文献提供的对第一手材料的评估远比我自己的判断要高明。我引用事实性资料，旨在确认对材料的相同或相异的阐释，引导有兴趣的读者寻找更多的资料来源，提供我对早期文明的描述赖以建立的阐释性文献的观点。在书末，我仅仅列出了那些确实被引用的文献目录。

我认为，对任何早期文明，我都不具备以此为专业的专家所拥有的知识，想必读者会发现我对早期文明的描述有事实错误或者骇人听闻的疏漏。但是，由多位作者组成团队研究早期文明也有其不足之处。我希望，全书一以贯之的观点可以弥补我对二手文献的严重依赖。

在本书的研究上，我得到了加拿大协会连续两届基兰资助金的资助。它使我能于 1990–1991 年摆脱在麦吉尔大学的大部分教学和所有的管理工作。1992 年和 1997 年，我受惠于麦吉尔大学的休假计划。没有这些慷慨的支持，我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完成本书的写作。

由于在 2001 年 1 月被擢升为詹姆斯·麦吉尔讲座教授，这让我有暇终定本书书稿，并付诸出版。感谢莎琳·玛沙达打印了提交给出版社的书稿，芭芭拉·麦兹格的专业排版让本书看起来更具可读性，基蒂萨克·查萨波恩为本书配了插图。我也要感谢杰西卡·库珀尔的杰出编辑才能，弗兰克·史密斯、卡米拉·克纳普和凯瑟琳·费佳尔负责出版流程，芭芭

拉·金为本书获取图像使用许可，罗伯特·斯汪森准备索引，伊丽莎白·路易斯校读清稿。

xiii 那些对理论讨论和结论的兴趣超出对其事实基础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第一章到第四章，还有关于我的发现的总结和分析的第十三、十八和二十七章，以及结论性讨论的第二十八和二十九章。不过，完全舍弃证据，孤立评价结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本书献给我的妻子，芭芭拉·维尔驰。她尽了远远超出一个妻子的责任，她热情的鼓励和批评促成了本书的形成。如我们共享的其他兴趣一般，我们都深深地着迷于比较研究——在她而言，是直接关心加勒比群岛和香蕉产业。

■ 目录 ||

前 言.....1

绪 论

第 1 章 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3

第 2 章 比较研究.....13

第 3 章 定义“早期文明”.....31

第 4 章 证据与阐释.....41

社会政治组织

第 5 章 王 权.....53

第 6 章 国家：城邦与广幅.....69

第 7 章 城市生活.....89

第 8 章 阶级系统与社会流动.....105

第 9 章 家庭组织和性别角色.....123

第 10 章 管 理.....143

第 11 章 法 律.....161

第 12 章 军事组织.....175

第 13 章 社会政治的统一性和多样性.....191

经 济

- 第 14 章 食物生产.....201
- 第 15 章 土地所有制.....227
- 第 16 章 贸易和手工业专门化.....243
- 第 17 章 财富的分配.....269
- 第 18 章 经济的统一性和多样性.....283

认知和象征层面

- 第 19 章 超自然力量概念.....293
- 第 20 章 宇宙论和宇宙源起论.....317
- 第 21 章 祭 仪.....335
- 第 22 章 超自然的祭司、节日和政治.....351
- 第 23 章 个人和宇宙.....369
- 第 24 章 精英艺术和建筑.....383
- 第 25 章 读写和专业知识.....413
- 第 26 章 价值和个人志向.....443
- 第 27 章 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451

讨 论

- 第 28 章 文化与理性.....463
- 第 29 章 结 论.....483

参考书目.....487

索 引.....531

■ 图版目录 ||

- 图 2.1 七大早期文明分布图.....24
- 图 2.2 早期文明比较年表.....25
- 图 6.1 城邦国家文明地图.....71
- 图 6.2 广幅国家地图.....79
- 图 7.1 美索不达米亚和约鲁巴的城市中心.....94
- 图 7.2 中美城市中心.....96
- 图 7.3 埃及和印加帝国的城市中心.....99
- 图 7.4 中国城市中心.....102
- 图 9.1 早期文明的房屋.....126
- 图 12.1 印加战争场景.....179
- 图 12.2 美索不达米亚战争场景.....187
- 图 14.1 美索不达米亚灌溉系统.....209
- 图 14.2 埃及农业盆地系统.....213
- 图 14.3 墨西哥谷地的农业.....219
- 图 16.1 早期文明中的纺织女工.....259

- 图 19.1 早期文明的神祇.....306
- 图 24.1 古典玛雅和墨西哥谷地的绘画风格.....386
- 图 24.2 郑州早商时期的青铜礼器.....388
- 图 24.3 早期文明中的雕像.....389
- 图 24.4 印加艺术形式.....391
- 图 24.5 国王征服敌人.....396
- 图 24.6 城邦国家的高台神庙.....403
- 图 24.7 城邦国家的王宫.....406
- 图 25.1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早期记录.....417
- 图 25.2 美索不达米亚符号的发展.....418
- 图 25.3 早期文明书写系统的正式文字.....419

绪 论



社会科学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相对于特定文化的特有因素，跨文化因素能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人类行为。这个讨论将回应，相对于历史特定主义的、受特定文化影响的、基本上是自为的认知现实的模式，人类行为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受到普世可见的自我利益考量的影响？马歇尔·萨林斯将这种对峙称为“实践和意义之间的角力”（Marshall Sahlins 1976: ix）。然而，这一讨论并未止步于此，它进而考虑人类在以类似的方式理解现实和行为方面上，多大程度是生物性预置的。这一讨论挑起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行为研究者和文化研究倡导者之争，过程主义考古学家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之争，以及传统的文化生态学家、达尔文主义考古学家、社会生物学家与新博厄斯主义后现代主义者之争。同时，它也将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的残存势力分裂成为两个相互对抗的阵营。

3

讨论的核心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考虑到人类的生物相似性和文化多样性，他们在类似情况下，行为异同将达到何种程度呢？无论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还是对于改变人类发展的未来轨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至关重要（Trigger 1998a）。近年来，不同理论立场都已经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完善，但是尚未显露出任何达成共识的苗头。为贡献于这一讨论，本书试图具体地总结分布在四大洲的七个早期文明的共性和差异。我认为，由于已经被证明不存在任何历史关联，这些共享特性要么是由所有人类群体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衍生的，要么就是受到类似的环境或功能制约，构成平行发展或协同进化的范例。跨文化差异反映了在这些制约之外的文化模式的影响。我希望，这些个案研究能揭示，对人类行为的不同解释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阐释特定资料。

4

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人类学同时追求两个既对立又互补的目标：证明任何地方的人们

在生物意义上都大体相同，同时褒扬见于世界各地的文化多样性。这两种关注都可以追溯到18世纪，前者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相关，而后者则与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和抵制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相关。这两种立场一直控制着西方的政治和知识活动，并且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

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者强调所有人类作为一个独立种属的成员所共享的特征。他们主张，尽管存在文化差异，各地人类的需求、驱使、动机、欲望、感受和情绪都是大体相同的。他们将文化定义成为人类习得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认为这种习得的行为比自然选择更为有效，因此在人类适应变化的环境上更具有进步意义（Boyd and Richerson 1985）。旅行家常常注意到，来自显著不同文化的人们即使在语言无法互通的情况下，也能理解对方行为的绝大部分内容（D. Brown 1991: 3）。丹·斯潘伯（Dan Sperber）提出，正因为行为差异并不是非常显著，民族志研究才有可能存在。理性的首要作用是满足世界各地大体相同的生物性和心理性需求（Sperber 1985）。萨林斯将其称为“实践理性”，以期与“文化理性”区分开来，他将“文化理性”定义成为受到特定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制约的决策过程，这多少值得质疑。所有人类思维都是象征性传达的，因此“实践理性”也是文化性编码的，而且通过不容置疑的行为规范代代相传（Sahlins 1976）。在这个方面，它和“文化理性”别无二致。“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之间的关键区分是，实践理性服务于基于泛人类特征的利益，却能传递特定文化。

5

理性主义者也将文化视为对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的适应，而并未受到这些约束之外的信仰的影响。他们并没有将过去看成恒久的身份、理想和行为模式的源泉，而是视其为因通过创造更好地适应环境的行事方式而得到传承的对象，代表对人类潜能的更全面的实现（Peel 1983: 7）。他们倾向于将宗教信仰价值和传统文化看成副产品。因此，他们认为意识和观念受制于物质性考量，并且主要以实践行为的编码和强化的形式而存在。

从理性主义视角看，任何个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全人类行为的缩影，并且，社会进程是无以计数的、建立在现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之上的、关系到对个人地位和幸福的判断的累积结果。通常，相对于对信仰和意识的研究，理性主义更重视对行为，特别是适应性行为的研究。他们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倡导即是明证。理性主义也鼓吹对跨文化相似性的研究，有时甚至视“独特的、异质性的和不可重复发生的特殊个案”为历史意外事件的结果，因此不具任何科学价值（Steward 1955: 209）。对跨文化重复发生的现象和对人类行为的理性阐释的强调并不鼓励对文化传统的兴趣。相反，它鼓励对社会文化进化的兴趣。

理性主义采取了多种形式阐释人类行为的统一性。其中最受欢迎的形式之一就是生态或经济因素决定或者严重制约了社会政治组织和信仰系统的发展。诸如最省力原则、相对稀缺程度以及个人或集体安全性等因素都被用来解释人类行为。这种方法通常低估了人类能动性的重要性,常常以理性计算不同策略的相对选择性优势来解释变化——按照萨林斯的说法(Sahlins 1976: 89–90),即将注意力从人类转移到生态系统。它同时也低估了人类行为的人类特质。另一种阐释方式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将控制权力和物质资源的社会竞争看成导致人类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这种阐释原本仅限于阶级社会,但是近年来,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提出在血缘、性别和年龄群体上存在类似竞争形式,而将其扩展到前阶级社会(Bloch 1985)。

众多理性主义者认同,理性只能实现和帮助控制人类行为,但是却不能激发人类行为。理性服务于根植于人类天性的驱动力。而人性又建立在普通生物学基础之上,生物学基础表现为类似的生理需求、知识形式和滋生类似的冲动和驱动力的心理状态(讨论进而深入到生物性因素是否可能导致男女之间显著的行为差异,而种族主义者则试图确定不同族群在生物学基础上的差异)。这个假设是,因为生物近似性,生活在类似环境下的人们将会对类似问题作出类似反应。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试图将社会机制建立在生物性和心理性需求基础之上(Malinowski 1939)。而乔治·默多克和唐纳德·布朗(Donald E. Brown)则认定人类在行为、思想、感受、身份、社会角色、劳动分工、语言的基本结构、推理、分类、心理潜质和象征等方面存在普遍性。布朗指出,即使是像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和克拉克·惠斯勒(Clark Wissler)这样的历史特定主义者也承认建立在共同的人类本性上的行为普遍规律(Brown 1991: 55–60)。博厄斯观察到,众多族群之间存在着思想和行为上的具体的、影响深远的众多相似性(Boas 1963 [1911]: 154)。

按照众多理性主义者的观点,这些普遍性的存在否定了行为主义的一个观点,即将人类思维视为白纸一张,经验可以被客观记录和理性分析。早期社会哲学家,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洛克(John Locke),都赋予人类以特定(尽管不同)的本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也认为,采集一狩猎社会中本质的社交性和慷慨性也会见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同时,为了避免支持认为人类行为是生物性决定的和不可改变的保守观点,马克思提出人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类所生存的社会形态决定的(Fuller 1980: 230–264, Geras 1983)。

现在,理性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基本的人类行为受到数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影响,自然选择已经“促成”人类大脑适应各种各样具体问题和一般问题的结构(D. Brown 1991: 85; Mithen 1996)。这类选择大多数被认为与小规模社会的问题相关,既包括群内地位竞

争，也包括为应付各种内部和外部问题而合作的需求。有人提出，直到数千年之前，人类一直存在这种环境之下，造成了所有人类群体共享的行为相似性（Carrithers 1992）。

7 个体利益是复杂的，而且不可以将其简化为与个人利益或者群体生态适应相关的理性计算。不同个人按照不同的方式排列他们追逐的目标，不同的理解可能导致为实现相同的目标而采用不同的策略。有时，他们可能认为，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保持同步时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Hardin 1968）。这样，即使在小规模社会之中，行为也可能高度多元化，各种各样的个人决定可能在社会策略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受目标驱使的个人行为可能与生态条件及其他外部制约条件按照复杂的方式结合起来。为了解释这种多样性，那些相信社会文化现象受到生态或经济因素最强烈、最直接的影响的人们常常认为，相同发展水平的社会之间的跨文化规则最集中地体现在经济机制上。他们也假设，社会和政治机制的跨文化多样性还有待发现，因为这些机制较少地受到环境或技术的直接制约，而在艺术、哲学和宗教信仰上，多样性更多，这些都是最容易受到历史特质影响的行为侧面（Friedman and Rowlands 1978b: 203–205, Gellner 1982）。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起始于针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反抗。众多知识分子认为，启蒙运动忽略了情绪和感知的重要性，也低估了对朋友、家庭、宗教、社区、地域、族群和国家的归依感。一般而言，浪漫主义关注人类社会引以为特色的文化多样性。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常常与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势力联系在一起，而法国大革命则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步调一致，它要求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等同的自由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也共同承担促进人类共同幸福的责任。

在社会科学之中，浪漫主义的最新表现是，后现代主义将文化传统看成历史建构的，能改变人们的感受、价值观，以及对新体验的反应的“阐释系统”。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文化是高度多元而独一无二的，这个观点经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马歇尔·萨林斯（Sahlins 1976; 1985）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及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等人类学家鼓吹而大行其道。由于蕴含了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特定主义，现代文化人类学看起来回归到博厄斯的人类学。

8 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人类生活在自我营构的有意义的图景之中，而这是临时建构的，绝非唯一。众多文化相对主义者一方面承认物质因素对文化秩序施加了真正的影响，另一方面否认任何特定的文化形式可以通过一系列特定的物质力量予以阅读（Sahlins 1976: 206）。在特定文化中，某种动物是否适合食用，是由历史因素，而不是理性因素决定的（Sahlins